

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影響之研究：以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

* 謝傳崇 ** 謝宜君

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的現況與三者關係。在研究方法上採用問卷調查法，並使用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的關係。本研究編製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之問卷，以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蒐集有效問卷 822 份，其中男女比例分別為 49.6% 與 50.4%。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知覺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之現況具有高度知覺，三者之間具相關性，且影響關係模式適配度良好。雖然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有顯著直接影響效果，但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之中介作用，能對學生幸福感產生更大的影響性，其影響效果也相對的提高。本研究建議教師採用正向領導帶領班級，影響學生學術樂觀，進而提升學生幸福感。

關鍵詞：正向領導、幸福感、教師領導、學術樂觀

* 謝傳崇，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本文通訊作者）

** 謝宜君，新竹縣清水國民小學教師

電子信箱：hsieh1968@gmail.com

來稿日期：2016 年 1 月 18 日；修稿日期：2016 年 5 月 23 日；採用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Student Well-be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s a Mediator

****Chuan-Chung Hsieh ** Yi-Chun Hsie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terrelationship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nd student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 in this stud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adopt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nd student well-being. Questionnaires pertaining to the above three variables we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and administered to a sample of six-graders from selected elementary schools. There were 822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with valid responses, completed by 49.6% male and 50.4% female six-grad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nd student well-being are high, a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Whil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has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student well-being, the effect is greatly enhanced in extent and in magnitude when mediated by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o improve student's well-being, especially through increased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should be widely practiced.

Keywords: positive leadership, well-being, teacher leadership, academic optimism

* Chuan-Chung Hsi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 Yi-Chun Hsieh Teacher, Ching Shui Elementary School, Hsinchu County
E-mail: hsieh1968@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January 18, 2016; Modified: May 23, 2016; Accepted: June 8, 2016

壹、前言

快速變動的社會環境下，教師不僅要面對來自不同家庭文化的孩子，更因少子化碰到許多過往未有的難題。例如：青少年犯罪、校園霸凌、拒學，甚至未來拒絕就業等皆將成為新一代社會問題。面對如此困境，要讓學生投入學習、樂在其中，還要教會學生學習工具，這些是老師的責任（王淑俐，2010）。如何讓學生在學習上得到樂趣，關鍵亦在老師；教師如何使學生在學習上獲得成就感，教師的正向領導將是重要關鍵。因此，教師運用正向領導帶領班級學生顯得格外重要。而正向領導的目的，也就在於幫助個人和組織突破困難，以達驚人的成就水準（Cameron, 2011/2008）。Youssef 與 Luthans (2012) 的研究指出正向領導是可消弭距離、文化的差異，有效地跨越文化的障礙。但正向的領導方式也並非忽視負向事件、盲目的樂觀，它所強調的是正向的溝通、樂觀的看待事物和發現所處的優勢，在問題和弱點中找出價值與潛在的機會，並在負向事件的基礎上發展正向的結果，這就是正向領導的意義與功能所在（謝傳崇，2011a，2012）。因此，教師使用正向領導方式引領學生，與學生維持正向關係，以正向的溝通與氣氛經營班級，讓學生在良好、友善的環境中體驗到正向領導，是具有意義的學習。

謝傳崇 (2013c) 指出樂觀讓人擁有強大的正向心理資本，釋放心理壓力促進身體健康，以希望面對艱困的環境；學術樂觀更聚焦在學術上的表現，讓人集中精力以提高學業成就。Tschannen-Moran、Bankole、Mitchell 與 Moore 則強調學生對學校的認

同、聯繫、依附、投入、承諾以及團結的感受，有助於學生學習（引自何家瑞，2014a）。因此了解學生學術樂觀現況，便能促使教師幫助學生克服與適應外來未知的壓力，並提高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

根據《親子天下》針對國中、小學生的「學習力大調查」顯示，許多學生「身體坐在教室內，靈魂卻不在」，這些教室裡的「客人」大多順從聽話，整體呈現出一種「專心聽講」的假象，他們雖然沒有放棄學習，但也沒有樂在學習（何琦瑜、賓靜蓀、張□文，2012）。Seligman、Ernst、Gillham、Reivich 與 Linkins (2009) 提出「幸福」應存在於學校教育的三大原因有（一）可以做為學習憂鬱的良藥（二）可提高生活中的滿意度（三）可以幫助學生學習到更具創造思維的方法。學生在校時間一天至少有 8-9 小時，幸福感不僅直接影響學生的情緒、學習表現、身心狀態，更影響到人際、家庭關係，因此，學生的幸福感應被重視。

影響學生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近年來國內外的研究中，有探討教師正向領導各層面與學生幸福感相關之研究（方紫薇、陳學志、余曉清、蘇嘉鈴，2011；包娛子，2013；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曾文志，2007；黃曼琳，2010；黃德祥、邱紹一，2012；Seligman et al., 2009）；有探討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術樂觀各層面相關之研究（張奕華、許正妹、顏弘欽，2011；謝傳崇，2013c；Beard, Hoy, & Woolfolk-Hoy, 2010；Hoy, Tarter, & Woolfolk-Hoy, 2006；Mascall, Leithwood, Straus, & Sacks, 2008；Woolfolk-Hoy,

Hoy, & Kurz, 2008)；也有探究學生學術樂觀各層面與學生幸福感相關之研究(王仲星、王欣星、張涵、周偉, 2009; 佐斌、張陸, 2007; 孟慧、梁巧飛、時艷陽, 2010; 林淑惠、黃韞臻, 2008; 陸洛, 1998; 黃韞臻、林淑惠, 2012; 鄧堅陽、程雯, 2009; Diener & Chan, 2011;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Seligman et al., 2009)。綜上文獻而論, 可發現教師正向領導對於學生幸福感是有正向的相關性, 而教師正向領導對於學生學術樂觀亦有著正向相關。特別是, 當學生感受到教師重視他的課業、師生之間的信任感越高、學生對於學校具有高度的歸屬感時, 學生的幸福感就會提高, 所以學生學術樂觀對於學生幸福感亦有著極大的正向影響性。然而整合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的研究闕如, 故本研究搜集資料以瞭解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術樂觀是否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 並驗證教師正向領導是否可透過學生學術樂觀的中介效果, 進而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

綜合上述,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 瞭解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整體與各層面之現況。(二) 檢視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之關係。(三) 探討學生學術樂觀對「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正向領導之意涵

正向領導是近年來新興的領導論述, 正

向領導者可增加組織成員自尊感、提高工作士氣、促進任務的完成。教師採用正向領導, 將可在班級營造正向氣氛、拉近師生的正向關係, 讓學生的學習更有意義更有效能。

(一) 教師正向領導的意義

正向領導是美國密西根大學管理與組織學教授 Kim Cameron 所提出, 他認為正向領導有三種涵義: 1. 正向領導可促進正向超越表現; 2. 正向領導是積極樂觀的取向, 或對於人類優勢、能力和潛能的關注; 3. 強調使人達到最好的狀態, 或培養善良的品德 (Cameron, 2011/2008)。Carolyn、Youssef-Morgan 與 Luthans (2013) 認為正向是可被觀察的現象, 它可以使過程與結果更具價值, 使人更加振奮、提升, 並以某種更好的方式改善現況。Kelloway、Weigand、McKee 與 Das (2013) 將正向領導定義為員工認知領導者的心理資本 (即希望、樂觀、自我效能和堅韌力)。

教師使用正向領導, 必會發揮其正向影響力, 營造正向、振奮、積極樂觀的氣氛, 促進學生正向超越的表現 (吳清山, 2013; 林新發, 2010; 謝傳崇, 2011a, 2011b, 2014; 謝傳崇、許文薇, 2014; Cameron, 2011/2008; Carolyn, Youssef-Morgan, & Luthans, 2013; Kelloway et al., 2013), 特別的是, 教師的正向領導亦會以正向的方式解讀學生行為, 並賦予學生自我肯定、改造社會的正向意義 (謝傳崇, 2011a、2011b、2014; 謝傳崇、許文薇, 2014)。

因此, 教師正向領導可定義為: 教師能以愛心教育學生, 採取正向溝通促進師生關

係，營造正向班級氣氛，促使學生學習過程與結果具有正向意義與價值，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二）教師正向領導的內涵

持正向的態度就能改變生活，教師以正向領導帶領孩童成長，能為孩子創造更多成功學習的機會與成就。Cameron(2011/2008)認為正向領導有四個內涵：1. 營造正向氣氛，2. 促進正向關係，3. 採取正向溝通，4. 構築正向意義。當人們知覺他們正在追尋遠大的目標或從事重要的工作時，便會產生顯著的正向效應。Carolyn、Youssef-Morgan 與 Luthans (2013) 認為正向領導可以希望感、效能、堅韌力與樂觀來評估。吳清山 (2013) 指出正向領導有助於領導者善用領導作為，發揮正向領導力量，其主要功能可歸納如下：1. 促進成員良性互動。2. 激勵組織成員潛能。3. 提升組織經營效能。

綜合國內外研究，吳清山 (2013) 以促進成員良性互動、激勵組織成員潛能、提升組織經營效能作為正向領導層面，缺少了營造正向的氣氛層面，而 Carolyn、Youssef-Morgan 和 Luthans (2013) 則認為正向領導是以希望感、效能、堅韌力與樂觀等情意向度作為衡量標準較為少見；教師正向領導的層面中，以「正向的氣氛」、「正向的關係」、「正向的溝通」與「正向的意義」等為多數研究者採用 (林新發, 2010; 謝傳崇, 2012; Cameron, 2011/2008)。因此，根據前述討論，本研究認為教師正向領導的構面應包含「正向的氣氛」、「正向的關係」、「正向的溝通」與「正向的意義」等，其說明如下：

1. 營造正向的氣氛：教師運用愛心、關心與學生彼此相互支持，共同營造正向班級氣氛，並有效幫助、增強正向的班級氛圍，帶動班級學生積極向學、不畏挫折的勇氣。
2. 建立正向的關係：教師以正向的領導方式促進教師與學生、家長之間的正向積極關係，使親師生緊密連結，共創親密的親師生關係、進而帶動老師出色的工作表現、學生良好的學業表現。
3. 保持正向的溝通：教師能以肯定、支持的言語取代消極、批評的言語，增加師生之間的信任感及學生學習的自信心。
4. 展現正向的意義：教師能夠對正在學習知識、情意、技能的學生，在其學習的過程與結果中賦予正向意義與價值，期望學生可擁有出色的學習表現。

二、學生學術樂觀之意涵

學術樂觀是他人帶不走的個人心理資本，會陪伴人一生。學術樂觀的適用對象不侷限於校長與老師，更可擴及至學生。Hoy、Tarter 和 Woolfolk-Hoy (2006) 發現學術樂觀形成出三元互動的正向學習環境，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高度影響，因此學生學術樂觀值得我們探討。

（一）學生學術樂觀的意義

學生層面的學術樂觀在 Wu (2012) 的研究中，包含學術自我效能感 (academic self-efficacy)、對教師的信任 (trust in teachers) 及家庭學術重視 (home academic press)。Tschannen-Moran、Bankole、Mitchell 和 Moore 認為學生學術樂觀即是師生之間具高度互信關係，學生重視學業成

就，且在學校受到讚揚，學生重視學校生活並有歸屬感(引自何家瑞，2014a)。官柳延(2014)認為學生學術樂觀係指學生對學校認同的行為參與、對教師信任感的鞏固、對聚焦學習表現的堅持，能讓學習者有更佳的表現。

綜合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可發現學生學術樂觀具備以下幾個概念：

1. 對學習知識的強調與重視：學生對課業、學習上的成就感相當重視(官柳延，2014；張奕華等人，2011；謝傳崇，2013a，2013b；Beard et al., 2010；Hoy et al., 2006；McGuigan & Hoy, 2006；Wu, 2012)。
2. 師生之間具相當程度的信任感：學生相信自己能夠學習，同時教師也相信學生能夠學會(官柳延，2014；張奕華等人，2011；謝傳崇，2013a、2013b；Beard et al., 2010；Hoy et al., 2006；McGuigan & Hoy, 2006；Wu, 2012)。
3. 學生對學校具高度的歸屬感：對自己的學校與班級具意識，並認為自己是群體中不可少的成員(官柳延，2014；謝傳崇，2013a，2013b；Hoy et al., 2006；McGuigan & Hoy, 2006；Wu, 2012)。

因此，本研究將學生學術樂觀定義為：學生對學校及班級擁有高度歸屬感，對於課業、學習上的成就感相當重視，並相信自己能夠學習，同時，教師也相信學生能夠學會。

(二) 學生學術樂觀的內涵

Tschannen-Moran、Bankole、Mitchell 和 Moore 的研究中，認為學生的學術樂觀應有：1. 師生之間的信任，2. 學術推力，3. 學生

對學校的認同(引自何家瑞，2014b)。Hsieh、Yen 和 Kuan (2014)認為學生學術樂觀之內涵包括：1. 學生對學校認同，學生為能成為學校的一分子而付出努力。2. 學生對教師信任，學生願意信任教師，建立互信的關係，彼此真誠相待。3. 學術強調，學校能為學生設定高水準卻可達成的目標，學習環境有秩序且嚴謹，學生具努力用功的動機及重視學習成就。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發現：學術樂觀的構面雖以「學術強調」、「師生之間的信任」、「效能感」等層面為多數研究者採用(張奕華等人，2011；謝傳崇，2013a；Hoy et al., 2006；McGuigan & Hoy, 2006；Woolfolk-Hoy et al., 2008)，但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學生，且學生較無法對工作有較公正的自我效能評估，因此採用 Hsieh 等人(2014)之研究發現，將學生學術樂觀的構面分為「學術強調感」、「師生信任感」與「學生歸屬感」等構面，其說明如下：

1. 學術強調感：學校或老師為學生設定較高且能達成的學習目標，並營造有秩序、友善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具高度學習動機且重視學習成就。
2. 師生信任感：教師相信學生能夠學習，學生也信任教師必能教會自己，彼此相互信任，真誠以待。
3. 在校歸屬感：對自己的學校與班級具意識，並認為自己是這大群體中不可缺少的成員。

三、學生幸福感之意涵

自 1990 年代起，西方逐漸重視心理，幸福感一詞躍上學術舞台。幸福感是體驗大量愉快情緒與極少不愉快情緒，及對生活的滿意。學校教育要有成效，必須讓學生感到幸福，以提升心理健康。

（一）學生幸福感的意義

幸福感是個人心理的感受，幸福感在個我與社我的研究上，Andrews 與 Withey (1976) 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對生活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正負向情緒整體評估而成的感受。陸洛 (1998) 認為幸福的來源除了來自「個我」層次的滿足、愉悅、掌控外，還包含「社我」層次的人際和諧。在情緒與認知方面，Seligman 等人 (2009) 將幸福感定義為：是接近愉悅的感覺，具正向情緒、強烈堅韌性和高度滿意度，並具自由選擇的意志能力；林純燕與徐秋碧 (2009) 認為幸福感可藉由個體的正負向情緒調整，使自己的生活滿意度提升。包娛子 (2013) 認為幸福感是體驗大量愉快情緒與極少不愉快情緒，及對生活的滿意。所以為獲得幸福感，更必須看重正向情緒經驗、提升心理健康、有更健全的身心狀態。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定義，可發現學生幸福感具有以下幾個概念：

1. 學生對生活與人際互動感到有意義且滿意 (王佳禾、侯季宜、張進上, 2008; 包娛子, 2013; 林純燕、徐秋碧, 2009; 林純燕、賴志峰, 2014; 黃曼琳, 2010; 陸洛, 1998; Andrews & Withey, 1976; Argyle, 2013)。

2. 學生具有正向、愉悅和充滿希望的情緒與感覺 (王佳禾等人, 2008; 包娛子, 2013; 林純燕、賴志峰, 2014; 林維芬、徐秋碧, 2009; 張芳全、夏麗鳳, 2011; 陸洛, 1998; 黃德祥、邱紹一, 2012; 黃曼琳, 2010; Andrews & Withey, 1976; Argyle, 2013; Seligman et al., 2009)。
3. 學生具強烈的堅韌性及自由選擇的意志，對學習感到滿意 (Seligman et al., 2009)。
4. 學生對自我身心健康感到滿意 (王佳禾等人, 2008; 林純燕、賴志峰, 2014; 林維芬、徐秋碧, 2009; 張芳全、夏麗鳳, 2011)。
5. 學生能自信地表達自我，對自我具有肯定的評價 (林純燕、賴志峰, 2014; 林維芬、徐秋碧, 2009; 陸洛, 1998)。

歸納上述觀點，學生幸福感可以定義為：學生從認知、情緒和身心健康層面，對自己整體生活產出的正向經驗，使生活充滿希望、意義且感到滿意，並能有自信地表達自我，對自我具肯定的評價。

（二）學生幸福感的內涵

幸福感來自個人在各個層面的感受滿意度，其內涵包羅萬象，Argyle (2013) 認為幸福感應有三種要素，其中包含正向的情緒與滿足感，以及較少的沮喪、焦慮與負面情緒。Diener (2000) 提出由生活滿意度、工作滿意度、正向情感以及負向情緒影響情況來測量幸福感。陸洛 (1998) 編製「中國人幸福感量表」，內含樂觀、工作成就、正向情感、自我滿足、身體健康、樂天知命等六個因素。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學生幸福感的構面解

釋分析，具有以下幾個概念：

1. 幸福感高的學生，具較強的正面情緒（林維芬，2012；陸洛，1998；黃德祥、邱紹一，2012；Argyle, 2013；Seligman et al., 2009）。
2. 學生會自主積極參與生活、體驗生活中的樂趣（包娛子，2013；Seligman et al., 2009）。
3. 學生擁有瞭解負向情緒的勇氣（包娛子，2013；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陸洛，1998；曾文志，2007；黃德祥、邱紹一，2012；Argyle, 2013；Seligman et al., 2009）。
4. 學生對生活與人際感到滿意（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陸洛，1998；黃曼琳，2010；黃德祥、邱紹一，2012；Argyle, 2013）。
5. 學生與家庭中重要他人相處感到滿意（王佳禾等人，2008；陸洛，1998；Argyle, 2013）。
6. 學生感到自我悅納，並肯定自我價值（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林純燕、賴志峰，2014；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陸洛，1998；黃曼琳，2010；Argyle, 2013）。
7. 學生對學習結果具有成就感（王佳禾等人，2008；陸洛，1998；Argyle, 2013）。
8. 學生擁有健康的身體與心理（包娛子，2013；林純燕、賴志峰，2014；張芳全、夏麗鳳，2011；黃曼琳，2010）。

根據前述討論，本研究將學生幸福感的內涵分為「富有意義的生活」、「人際家庭的

和諧」、「對於自我的滿意」，及「對於學習的滿意」等構面，其說明如下：

1. 富有意義的生活：指學生對日常生活富有理想與目標，使自身更加振奮與滿意所下的決定，更加喜愛自我（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Seligman et al., 2009）。
2. 人際家庭的和諧：指學生樂於與家中成員、朋友互動、分享，能相互尊重，且家中氣氛圓融和諧（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陸洛，1998；黃曼琳，2010；黃德祥、邱紹一，2012；Argyle, 2013）。
3. 對自我的滿意：指學生能對自己的表現、自我的才能與自我價值感到滿意與肯定，進而獲得自我悅納的滿足感（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林純燕、賴志峰，2014；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陸洛，1998；黃曼琳，2010；黃德祥、邱紹一，2012；Argyle, 2013；Seligman et al., 2009）。
4. 對學習的滿意：指學生對於學習各項事物的表現與成就，能夠得到正向回應與自我實現（王佳禾等人，2008；陸洛，1998；Argyle, 2013）。

四、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之相關研究

（一）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在黃曼琳（2010）正向管教研究中發現，教師正向鼓勵的溝通方式與學生幸福感具正

向關係；在周淑華（2009）正向管教與學生幸福感的研究中，國民小學教師正向支持的氣氛最爲顯著；陳思縈（2011）發現，當孩子察覺事件的正向意義時會產生好的信念、懷抱希望，勇敢面對種種不如意。國外的正向領導與幸福感相關研究僅有一篇，Kelloway 等人（2013）發現，當領導者的轉型領導與濫用領導兩因素得到控制，正向領導行爲便能預測特殊與非特殊情況的幸福感。意即教師如使用正向領導，便能成功預測孩童在不同情境中的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推論教師採取正向關係、正向溝通、正向氣氛與正向意義等正向領導方式帶領班級學生，會帶給學生較高的幸福感。

（二）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影響之研究

Mascall 等人（2008）提到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間的良性互動，彼此相互支持、信任，並協調共同目標，這樣的過程有助於提高教師的學術樂觀、課堂管理實踐、培養學生學習信任、樂觀和增加學生的學業進展等行爲。Hoy 等人（2006）、Woolfolk-Hoy 等人（2008）、Beard 等人（2010）認爲重視學生學習，效能感、信任感是建構學術樂觀的重要特徵，且此三者形成高度相關的依存交互關係，並認爲這是影響學校領導者與教師發展的驅動力。Hoy（2012）也發現組織性質的特點將影響學生學習成就。這顯示教師對學生的正向領導中「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與「展現正向意義」四層面與學術樂觀的「教師效能感」、「集體信任感」與「重視學生學習」有密切關聯。

綜上研究所述（張奕華等人，2011；謝傳崇，2013b；Beard et al., 2010；Hoy, 2012；Hoy et al., 2006；Mascall et al., 2008；Woolfolk-Hoy et al., 2008），可發現教師正向領導「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保持正向溝通」與「展現正向意義」等與學生學術樂觀「學術強調感」、「師生信任感」與「在校歸屬感」等確實存在正向的影響。

（三）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幸福感影響之研究

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2000）研究發現，正向心理學與幸福感、滿意度、心流、樂觀、希望感有正向影響性，證明幸福感與樂觀密切相關。Seligman 等人（2009）認爲幸福要具備快樂主義的生活態度，也就是正面情緒，如快樂、樂觀等，當學生的樂觀程度高，學生的幸福感也就高。主觀幸福感大師 Diener 與 Chan（2011）指出高度的幸福感有七項證據，如：生活滿意度、無負向情緒、樂觀、正向情緒……等，幸福感是一種異質性結構，包含樂觀與低怒的工作滿意度。更深入地了解，幸福感的層面中，正向的情緒包含樂觀態度，而樂觀的態度能使人健康與長壽，這顯示學生的樂觀態度會正向地影響學生幸福感。在陸洛（1998）編製「中國人幸福感量表」中，就包括樂觀、工作成就、正向情感、自我滿足、身體健康、樂天知命等六個因素。所以學生如有幸福感，就要先有高程度的學生樂觀。黃韞臻與林淑惠（2012）發現，學生能有效調適自己的情緒，養成樂觀進取的態度，提昇自我價值，對自身有更正向積極的評價，整體自我概念便能更趨正向，進而容易感

受生活中的幸福。學生擁有學術樂觀態度可提升自我價值，能在生活中獲得較多的正向評價，當擁有正向評價時，學生在生活中就較易感受到幸福，由此可知，學生樂觀對學生幸福感具密切正向影響。

本研究從「學生學術樂觀」層面對「學生幸福感」分析，發現「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確實有正向影響存在。

（四）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幸福感具顯著正向影響（Kelloway et al., 2013）；師生關係越佳，越影響學生幸福感（包娛子，2013；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黃曼琳，2010），而班級擁有越佳的正向情緒氣氛，學生的幸福感受越高（方紫薇等人，2011；林維芬、徐秋碧；黃曼琳），教師以正向溝通方式管教學生，其幸福感越佳（王佳禾等人，2008；黃曼琳），且學生自主積極參與生活、體驗生活樂趣，讓自己的生活更有意義，使其受正向的改變，幸福感較高（包娛子；Seligman et al., 2009），因此可知，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Mascall 等人（2008）研究中發現教師正向領導中的建立正向的關係、保持正向的溝通與展現正向的意義對學生學術樂觀的學術強調感與師生信任感有正向影響性；謝傳崇（2013c）的研究發現正向領導中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保持正向溝通與展現正向意義四個層面與教師學術樂觀的理念有正向影響性；張奕華等人（2011）的研究中，

正向領導的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保持正向溝通與展現正向意義與學生學術樂觀的層面有正向影響性；Beard 等人（2010）、Hoy 等人（2006）、Woolfolk-Hoy 等人（2008）、研究顯示教師正向領導的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與展現正向意義與學術樂觀的教師效能感、集體信任感與重視學生學習有密切正向關聯，因此可知，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術樂觀有顯著正向影響。

在陸洛（1998）、黃韞臻與林淑惠（2012）、Diener 與 Chan（2011）、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2000）、Seligman 等人（2009）的研究中發現，學生樂觀的態度對學生幸福感有高度正向影響，進一步，從學生學術樂觀層面對學生幸福感的影響深究，孟慧等人（2010）、佐斌與張陸（2007）更指出，學生學術強調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正向影響性存在。王仲星等人（2009）、林淑惠與黃韞臻（2008）研究發現，學生學術樂觀中的師生信任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正向影響存在。林淑惠與黃韞臻（2008）、鄧堅陽與程雯（2009）發現，學生在校歸屬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正向影響性存在，由此知，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具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推測教師正向領導會影響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而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之間呈現高度正相關；教師正向領導能有效預測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表現，而學生學術樂觀亦可有效預測學生幸福感，因此推測學生學術樂觀可能為中介變項。

（五）本研究假設模式

本研究從國內外文獻中整理出教師正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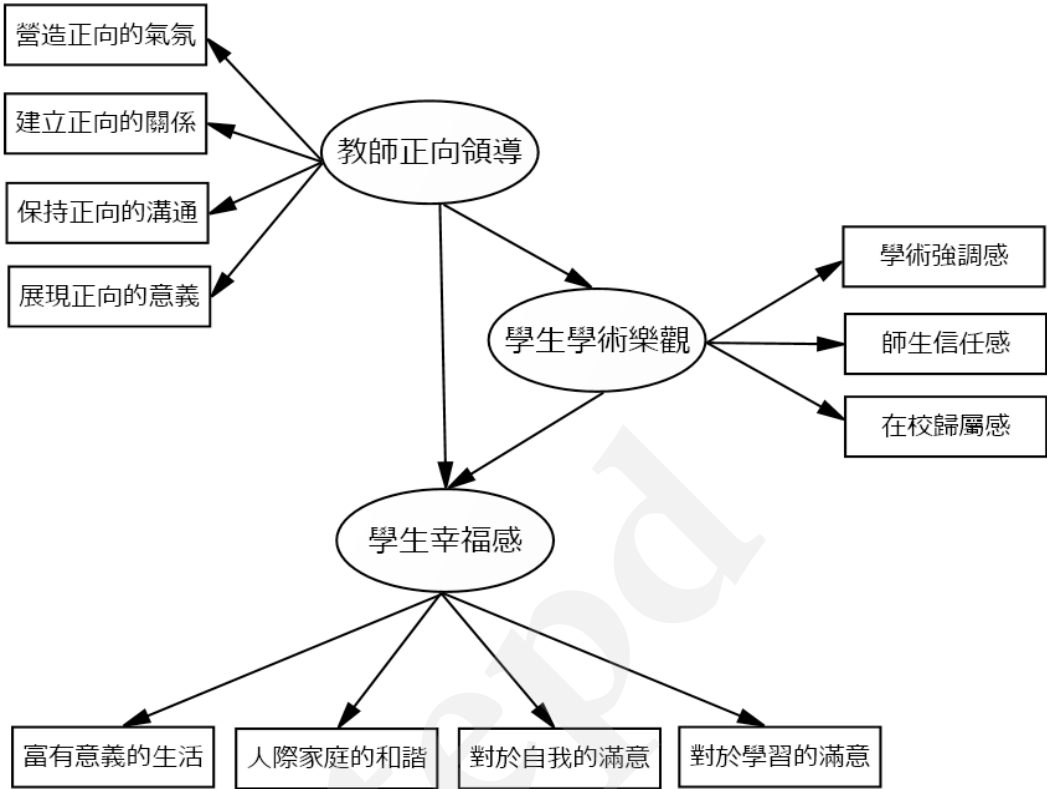


圖 1 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之影響：以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之假設模式圖

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的關聯性作為參考依據，並建立結構模式如圖 1，其旨在說明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除了直接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外，亦能透過學生學術樂觀的中介作用，間接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係以 103 學年度教育部公告之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四地區公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為母群體，以班級為抽樣單位，採分層叢集取樣方式，抽取預試樣本及正式

樣本。依據教育部教育統計資料(2014)顯示，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班級數 6 班以下有 243 所(57.72%)，7-24 班有 141 所(33.49%)，25 班以上 37 所(8.07%)。

(一) 預試調查對象

預試問卷抽取桃園縣、新竹縣市及苗栗縣四地區公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為預試對象，共抽樣 10 所學校，發出預試問卷 375 份，回收 283 份，回收率 75.47%，其中有效問卷 243 份，無效問卷 40 份，可用率 85.86%。

(二) 正式調查對象

本研究對象係以桃園縣、新竹縣市及

苗栗縣公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進行分層叢集抽樣，為掌握問卷題項適切性，依據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及苗栗縣 103 學年六年級學生人數之比例，決定各地區抽樣份數，桃園縣抽樣 585 份（學生數所占比率為 58.5%）、新竹縣抽樣 151 份（學生數所占比率為 15.1%）、新竹市抽樣 122 份（學生數所占比率為 12.2%）、苗栗縣抽樣 142 份（學生數所占比率為 14.2%）。學生總人數為 43320 人，約取母群體人數之 2.31% 為研究樣本，共發出 1001 份問卷，回收 898 份，整體回收

率 89.71%，其中有效問卷 822 份，無效問卷 76 份，可用率 91.54%，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析詳見表 1。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製依據

本調查問卷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包含學生性別、導師性別以及家庭結構等三個背景變項。第二部分為「教師正向領導」量表，問卷係參考謝傳崇（2011a）之調查問卷修正編製而成。第三部分為「學生

表 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背景變項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08	49.64
	女	414	50.36
家庭狀況	雙親家庭	670	81.51
	其他	152	18.49
班導師性別	男	226	27.49
	女	596	72.51
區域	桃園縣	347	42.21
	新竹縣	103	12.53
	新竹市	222	27.00
	苗栗縣	152	18.49
學校規模	1-6 班	94	11.44
	7-24 班	193	23.48
	25 班以上	535	65.09

幸福感」量表，係參考王佳禾等人(2008)之調查問卷修正編製成。第四部分為「學生學術樂觀」量表，係以參考官柳延(2014)之問卷編修。問卷初稿完成後，邀請九位教育學者與實務專家，協助鑑定問卷內容的代表性與適當性，據以作為專家內容效度，並依此修正問卷。

(二) 信度分析

研究者針對「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影響之研究：以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之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分析，本研究之量表採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而三個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整體係數分別為 .936、.913、.944，教師正向領導的各因素層面之 Cronbach's α 在 .771~.845，學生學術樂觀的各因素層面之 Cronbach's α 在 .750~.841，學生幸福感的各因素層面之 Cronbach's α 在 .811~.898，顯示本問卷信度良好。

(三) 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預試分析，先採取極端組比較與內部同質性檢驗，教師正向領導量表的 20 個題目、學生幸福感的 20 個題目、學生學術樂觀的 22 個題目，其 CR 值皆達到 .001 顯著水準，各題目與量表總分之間，其相關皆達 .01 顯著水準。其次，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前，先進行 Bartlett 和 KMO 檢定，以決定此量表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在教師正向領導部分，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 5953.50 ($p<.001$)，KMO 值為 .79。因此，教師正向領導量表可進行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有四個，為塑造正向的氣

氛、建立正向的關係、保持正向的溝通、展現正向的意義，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82.69%。在學生幸福感部分，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 5271.99 ($p<.001$)，KMO 值為 .88，學生幸福感量表的因素有四個，為富有意義的生活、人際家庭的和諧、對於自我的滿意、對於學習的滿意，累積的解釋變異量 73.684%。在學生學術樂觀部分，Bartlett 球形檢定值為 11480.71 ($p<.001$)，KMO 值為 .89，學生學術樂觀的因素有三個，為學術強調感、師生信任感、在校歸屬感，累積的解釋變異量為 81.18%，三個變項均符合量表建構之基本要求。

(四) 計分方式

本問卷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方式作答與計分，均為正向描述題，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2、3、4、5 分，加總後即國小學生對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以及學生幸福感的知覺。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知覺愈高，反之，得分越低表示受試者知覺較低。

(五) 資料分析

問卷調查資料採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及 AMOS 18.0 for Windows 作為本研究資料分析工具。對於變項現況，本研究以問卷各題項得分之平均數作為分析依據，採吳明隆(2011)：五點量表平均數 1.8 以下為低等程度，1.81~2.60 為中下程度，2.61~3.40 為中等程度，3.41~4.20 為中上程度，4.21 以上為高程度。對於三個變項的關係，本研究使用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以

檢視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的關係。

肆、結果與討論

一、國民小學學生知覺的現況結果與討論

（一）教師正向領導的現況

整體而言，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知覺「教師正向領導」整體平均數為 4.24，標準差 .63，顯示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整體教師正向領導有高度知覺。就教師正向領導的分層面而言，以「建立正向的關係」平均得分最高，達 4.29，標準差 .79，顯示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教師以正向領導方式促進師生間正向積極關係具高度知覺，使師生行為、想法更為緊密連結，進而帶動老師出色的工作表現、學生良好的學業表現；以「保持正向的溝通」平均得分最低，其平均數為 4.17，標準差 .74，顯示與其他層面相較之下，小學六年級學生認為教師較不能以肯定、支持的言語取代消極、批評的言語，此造成師生之間信任感及學生學習的自信心有所減退。

（二）學生幸福感的現況

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幸福感」整體平均數為 4.05，標準差 .68，顯示小學六年級學生對幸福感有中上程度知覺。就學生幸福感的分層面而言，「人際家庭的和諧」平均得分最高，達 4.19，標準差 .86，顯示小學六年級學生與「家中成員、朋友樂於互動、分享，能相互尊重，且家中氣氛圓融和諧」具有中上程度知覺；在「對於自我的滿意」得分最低，平

均數為 3.79，標準差 .87，顯示「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自我的才能與自我價值較無法感到滿意與肯定，所以進而無法獲得自我悅納的滿足感」。

（三）學生學術樂觀的現況

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知覺「學術樂觀」整體平均數為 4.12，標準差 .68，顯示小學六年級學生對學術樂觀有中上程度知覺。就學生學術樂觀的分層面而言，「師生信任感」平均得分最高，達 4.24，標準差 .73，顯示學生對導師能相信自己能學會，學生也同樣信任老師必定能教會自己，彼此具強烈的信任感並真誠以待；得分最低的為「在校歸屬感」，其平均數 4.01，標準差 .81，顯示學生對自己的學校與班級認同感稍嫌不足，進而無法獲得較高的學術樂觀感。

二、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之關係

為了檢視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與學生幸福感之關係，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進行分析。首先討論整體模式的適配度，其次進行結構模式分析，再檢視變項間的合理徑路，最後檢視中介作用。

（一）整體模式適配度檢定

在違犯估計值檢定，從整體模式的非標準化估計發現，各觀察變項的誤差變異有 13 個，其值介於 .384~.925 之間，皆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且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整體模式無違犯估計原則，模式大致符合基本適配度考驗。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之檢定，從表 2 可知，在絕對適配度檢定

表 2

中介模式適配度評鑑指標及結果摘要

指標名稱	適配判斷值	指標值	適配判斷
絕對適配度指標			
χ^2	愈小愈好， $p>.05$	144.700 ($p=.000$)	不適合
GFI	>.90 以上	.950	佳
AGFI	>.90 以上	.920	佳
RMR	<.05 以上	.013	佳
SRMR	<.05 以上	.0313	佳
RMSEA	<.05 以上 (適配良好) <.08 (適配合理)	.069	佳
增值適配度指標			
NFI	>.90 以上	.966	佳
RFI	>.90 以上	.954	佳
IFI	>.90 以上	.975	佳
TLI	>.90 以上	.967	佳
CFI	>.90 以上	.975	佳
簡約適配度指標			
PGFI	>.5 以上	.590	佳
PNFI	>.5 以上	.720	佳
PCFI	>.5 以上	.727	佳
AIC		194.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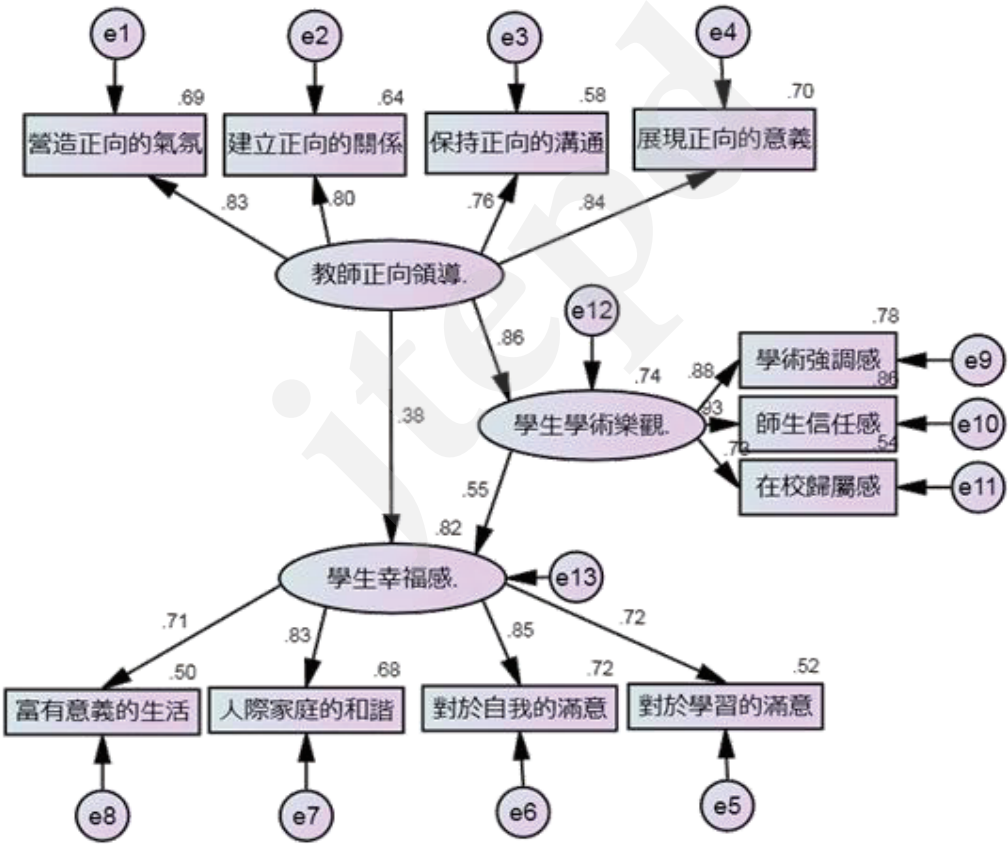
上， χ^2 值為 144.700 ($p=.000$) 達顯著水準，表示理論模式與實際資料存在差異；而 GFI 值為 .950，AGFI 值為 .920，皆 >.90 以上，RMSEA 值為 .069 (<.08) 適配度尚可；在增值適配度方面，各指標數值皆 >.90 以上，適配度佳；在精簡適配度指標方面，各指標數

值皆 $>.50$ 以上，整體而言，唯 χ^2 值因大樣本的原因，數值偏高僅作參考，所以，以卡方自由度比值 3.529 來看，在較寬鬆的規定值 5.0 來看，適配度尚可，模式的其他各項指標皆符合模式適配度考驗，顯示本研究之假設模式整體適配度情況大致良好。

(二) 結構模式分析

確認問卷之適切性後，本研究從圖 2 的

分析顯示，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幸福感等三條路徑，路徑分析之標準化回歸係數分別為 .860、.384、.551，且都達顯著水準 ($p<.001$)，表示此三條路徑皆能有效反映模式假設，亦表示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及學生幸福感皆具有有效且直接的影響性。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有直接有效的影響，與 Kelloway 等人(2013)的結果相同。



Standardized estimates
卡方值=144.700 (P值=.000) 自由度=41 卡方自由度比值=3.529
RMSEA=.069 GFI=.950 AGFI=.920
NFI=.966 RFI=.954 IFI=.975 TLI=.967 CFI=.975
PGFI=.590 PNFI=.720

圖 2 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之影響：以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之結構

表 3

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之影響：以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之結構模式彙整表

項目	非標準化估計值	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誤 SE	t 值
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	.755	.860	.039	20.104***
學生學術樂觀→學生幸福感	.531	.551	.072	7.413***
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	.333	.384	.064	21.505***
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 →學生幸福感		.858	-	-

*** $p<.001$

（三）檢視變項間的合理徑路

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直接影響，標準化迴歸係數值達 .384，而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作為中介，進而影響學生幸福感，此一中介路徑標準化效果值達 .474 (.860*.551)，明顯高於直接效果 .384 之值，顯示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作為中介，對學生幸福感具有更大之影響效果，因此，教師正向領導若透過改善學生學術樂觀，可明顯提升學生幸福感。

（四）檢視中介作用

為檢定本研究之中介模式是否可得到支持，本研究以 Sobel test 檢定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為中介變項對學生幸福感的影響，Sobel 間接效果之考驗公式 (Preacher & Leonardelli, 2001) 如下：

$$Z = \frac{a \times b}{\sqrt{b^2 \times s_a^2 + a^2 \times s_b^2}}$$

其中 a 為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未標準化徑路係數，b 為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幸福感未標準化徑路係數，Sa 為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未標準化徑路係數的標準誤，Sb 為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幸福感未標準化徑路係數的標準誤。經統計計算求得「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學生幸福感」模式中，a=.755、b=.531、Sa=.039 與 Sb=.072，Z 值 為 6.8918 (S.E.=.030， $p<.001$) 因此，本研究學生學術樂觀之中介效果獲得支持。

三、綜合討論

（一）現況之討論

首先，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整體教師正向領導有高度知覺，然而本研究結果從向度分析，不同於以往研究以正向溝通較高（謝傳崇、蕭文智、王玉美，2015）、正向關係較低（謝傳崇，2014；謝傳崇、許文薇，2014），而是以「建立正向的關係」較高，「保持正向的

溝通」較低；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覺知教師正向領導在「營造正向的氣氛」、「建立正向的關係」、「展現正向的意義」三向度上皆具同等程度的感受，唯獨「保持正向的溝通」較低，顯示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普遍認為班導師能運用愛心、關心相互支持彼此，營造正向班級組織文化氣氛，使學生在學習過程與結果更具正向意義與價值，教師能以正向方式成就同學有正向表現，使同學們更加振奮、提升學習成效，但教師對學生的理解稍嫌不足，在處理學生不當行為時可能因情緒或其他因素，無法公正處理。

其次，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整體幸福感有中上度知覺，本研究結果從向度分析，發現如王佳禾等人(2008)、黃曼琳(2010)的研究相仿，以「人際家庭的和諧」較高，「對於自我的滿意」較低，四向度之平均分由高至低，分別為 4.19、4.14、4.01、3.79，可知學生從情緒、認知和身心健康層面，對自己整體生活產出主觀、正向之經驗，使生活充滿希望、意義且感到滿意，唯獨對自我滿意度不足，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自我的才能與自我價值較無法感到滿意與肯定，進而無法獲得自我悅納的滿足感。

再則，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整體學術樂觀有中上程度知覺，研究結果從向度分析，發現與官柳延(2014)的研究相仿，「師生信任感」之平均得分最高，「在校歸屬感」最低，不同於謝傳崇(2014)的研究是以「學術強調感」最低，顯示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普遍對課業、學習上的成就感相當重視，並相信自己能夠學習，同時教師也相信學生能夠學會，但對學校及班級的歸屬感稍低。

(二) 中介作用之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教師正向領導對於學生幸福感有顯著的直接影響效果，此與 Kelloway 等人(2013)的研究結果：領導者使用正向領導會影響下屬的工作幸福感雷同；也與方紫薇等人(2011)、王佳禾等人(2008)、包娛子(2013)、林維芬(2012)、林維芬、徐秋碧(2009)、張芳全、夏麗鳳(2011)、黃曼琳(2010)、Seligman 等人(2009)，認為正向領導的層面與幸福感的層面有顯著正向影響之研究結果相似。其次，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學術樂觀有直接影響效果，這與 Hoy 等人(2006)、Woolfolk-Hoy 等人(2008)、Beard 等人(2010)的研究中，正向領導的「營造正向氣氛」、「建立正向關係」與「展現正向意義」三層面對學術樂觀有正向影響相類似；也與謝傳崇(2013c)、張奕華等人(2011)、Mascall 等人(2008)的研究發現，正向領導的層面對學生學術樂觀的層面有正向影響之發現相似。

再則，學生學術樂觀對學生幸福感具有直接影響效果，這與陸洛(1998)、黃韞臻與林淑惠(2012)、Diener 與 Chan(2011)、Seligman 與 Csikszentmihalyi(2000)、Seligman 等人(2009)的研究發現，學生樂觀的態度對學生幸福感有高度正向影響相似，從其層面分析，又與孟慧等人(2010)、佐斌與張陸(2007)研究中，學生「學術強調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正向相關存在，在王仲星等人(2009)、林淑惠、黃韞臻(2008)研究中，學生學術樂觀中的「師生信任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正向相關存在，在鄧堅陽與程雯(2009)、林淑惠與黃韞臻(2008)的研究發

現，學生「在校歸屬感」與學生「幸福感」具有正向相關。

綜上研究發現與相類似研究對照，教師正向領導會正面影響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而學生學術樂觀也會正面影響學生幸福感；教師正向領導能有效預測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表現，而學生學術樂觀亦可有效預測學生幸福感，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除了直接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外，亦能透過學生學術樂觀的中介作用，間接正向影響學生幸福感。由以上之模式建構、違犯估計檢定、適配度測量、中介效果檢定等分析可知，本研究理論模式可獲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 (一) 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對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學生幸福感現況具高度知覺，以「建立正向的關係」、「人際家庭的和諧」、「師生信任感」等層面最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學生幸福感整體知覺之現況良好。學生對教師正向領導現況中，以「建立正向的關係」最高，「保持正向的溝通」最低，班導師能運用愛心、關心與學生彼此相互支持，師生有著良好信任關係，唯教師較無法以肯定、支持的言語取代消極、批評的言語以增加學生學習自信心。學生對學術樂觀現況中，以「師生信任感」最高，「在校歸屬感」最低，學生相信自己能夠學習，同時教師也相信學生能夠學會，但對學校及班級歸屬感

稍低。學生對幸福感現況中，以「人際家庭的和諧」最高，「對於自我的滿意」最低，學生樂於與家中成員、朋友互動分享，並能相互尊重，唯學生對自己的表現、自我的才能與自我價值較不感到滿意與肯定。

- (二) 「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學術樂觀→學生幸福感」理論模式經考驗成立

在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的適配度考驗上，13 個觀察指標的相關係數介於 .384~.925，顯示觀察指標之間具密切相關性存在，亦即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存在直接、間接及整體效果的因果關係，教師正向領導、學生幸福感與學生學術樂觀三者構面間確實存有相互影響關係，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理論模式之合理性。所以，教師應充份營造正向的班級氣氛、保持師生互動、正向意義性的正向溝通，以建立良好師生關係，透過強化師生信任感、歸屬感與學業學習，必能有效提高學生幸福感。

- (三) 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影響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直接效果為 .384，間接效果為 .474，總效果為 .858；換言之，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直接影響力 38.4%，教師正向領導對學生幸福感間接影響力 47.4%，總效果為 85.8%，因此，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會透過學生學術樂觀，間接影響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具有「部分中介變項」特質。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式得出較嚴謹的線性關係，發現教師正向領導

直接對學生幸福感的影響力不大，但若從學生學術樂觀中的「師生信任感」、「學術強調感」及「在校歸屬感」著手，學生幸福感可得到 85.8% 的整體效果。

二、建議

（一）理解學生心理與行為，增加師生溝通管道

研究發現學生知覺教師正向領導的四大向度中，以「保持正向的溝通」分數最低，所以教師須充分觀察，進而思考、理解學生各種狀況行為與想法，透過科技工具打破時空界線，使用各種學生常用的網路社群媒介引導學生，增加師生溝通管道與時間，找到適合的方法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使教師能增進對學生的認識。教師可以採用以下具體方法來增加師生溝通：包括教師要深入觀察學生，適時與其溝通、透過班級網頁或社群網站，增加師生溝通管道與時間、增辦教師情緒管理課程，以有效處理學生不當行為等。

（二）營造歡樂學習校園，提升學生在校認同

研究發現學生知覺學術樂觀的三大向度中，以「在校歸屬感」的分數最低，為提高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讓學生認為自己是學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對學校與班級付出努力，學校應營造友善的學習校園，並鼓勵教師以孩童的性向嘗試多元教學，以提升學生學習動力。學校可以採用以下具體方法來增加學生歸屬感：包括汰換校園老舊、不適用之硬體設施（如：操場、球場、資訊教室、生態園區、實驗教室等）、增置班級優異表現獎牌（如：學業表現優異、創新表現與領導優異等各種

獎勵）、規劃創新教學與計劃性課程，增強學生學習興趣。

（三）規劃學生個性學習，增強自我自信心

研究發現學生知覺幸福感四大向度中，以「對於自我的滿意」分數最低，顯示學生對自我能力與表現較缺乏自信，或對自我表現感到不滿，其因素來自家庭壓力、自我壓力、社會期望，以及傳播媒體傳遞的訊息等。學校可以採用以下具體方法來增加學生自我滿意度：包括對學生興趣與擅長事物給予充分機會嘗試、規劃專業個性課程、鼓勵學生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表現，以及師生共同規劃合理、可達成的目標等。

（四）強化學生學術樂觀，增進學生幸福感

研究結果發現，教師正向領導透過學生學術樂觀影響學生幸福感，學生學術樂觀具中介效果。教師正向領導雖能直接影響學生幸福感，但透過學生學術樂觀更能提高學生幸福感，所以奠定良好師生信任感、在校歸屬感與學術強調感，才能有效提升學生幸福感。學校教師可以採用以下正向領導策略：1. 為學生量身訂製學習目標與進度，營造班級正向學習環境，打造有秩序與友善的學習空間，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2. 有計畫地規劃教學，並適時提供學生學習上的協助，於彈性課程或閒暇規劃師生對話與生活問題對談，或是以小信件、小紙條方式傾訴生活趣事。3. 成立多元社團，聘請校內外專業師資共同指導學生學習，打開孩童各項才能與興趣，奠定課業以外的成就感。4. 帶領孩童走出教室，與社會自然人文相接觸，並與生活接軌，進行體驗式教學。

(五) 教師正向領導可透過學生學術樂觀，有效提升學生幸福感

教師如能善用正向領導作為，透過正向溝通、建立正向關係、營造正向氣氛與正向的學習意義去影響學生學術樂觀，提高學生學習動力，學生將有更高的學術樂觀感，進而提高學習成就。所以，建議教師宜透過教師的正向影響力影響學生學術樂觀的中介效果，以增進學生幸福感。教師可採取以下策略：1. 傾聽與接納學生各種想法，提高在校歸屬感。2. 以肯定句代替否定句溝通，進而提高師生信任感。3. 賦予學生學習意義，增加學生學習動力。

(六)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除教師正向領導及學生學術樂觀會影響學生幸福感，影響學生幸福感的變項尚多，例如：父母親的管教方式與態度、生活壓力的來源與性質等，因此，改變不同的研究變項，更能了解學生幸福感影響之因素與程度，使研究更加完善與深入。

參考文獻

- 方紫薇、陳學志、余曉清、蘇嘉鈴 (2011)。正向情緒及幽默有助於國中生之科學問題解決嗎？*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6 (4)，43-68。
- [Fang, T. W., Chen, H. C., She, H. C., & Su, C. L. (2011). Whether positive emotions and humor can improve the science problem-solving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6(4), 43-68.]
- 王仲星、王欣星、張涵、周偉 (2009)。信任、心理控制源對醫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國健康心理學雜誌*，17 (2)，143-144。
- [Wang, Z. X., Wang, X. X., Zhang, H., & Zhou, W. (2009). Influence of trust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s.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7(2), 143-144.]
- 王佳禾、侯季宜、張進上 (2008)。國小學童幸福感量表之編製。*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4，57-85。
- [Wang, C. H., Hou, C. Y., & Chang, C. S. (2008). The construction of well-being scale for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4, 57-85.]
- 王淑俐 (2010)。積極正向的教學。*臺灣教育*，666，38-41。
- [Wang, S. L. (2010). Positive education.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666, 38-41]
- 包嫻子 (2013)。在家自行教育與學校教育學生學習適應、幸福感之比較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 [Bao, Y. Z. (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earning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between homeschooling and schooling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nchu, Taiwan.]
- 佐斌、張陸 (2007)。學習目標和人際關係對

- 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 15 (1), 37-39。
- [Zuo, B., & Zhang, L. (2007). Influence at study goal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undergraduates' subjective well-being.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5(1), 37-39.]
- 何佳瑞(2014a)。學生學術樂觀：驗證性因素分析(上)(原作者:Tschannen-Moran, M., Bankole, R. A., Mitchell, R. M., & Moore, D. M.)。教育研究月刊, 241, 102-121。
- [Tschannen-Moran, M., Bankole, R. A., Mitchell, R. M., & Moore, D. M. (2014).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 J. Ho, Trans).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41, 102-121.]
- 何佳瑞(2014b)。學生學術樂觀：驗證性因素分析(下)(原作者:Tschannen-Moran, M., Bankole, R. A., Mitchell, R. M., & Moore, D. M.)。教育研究月刊, 242, 115-138。
- [Tschannen-Moran, M., Bankole, R. A., Mitchell, R. M., & Moore, D. M. (2014).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 J. Ho, Trans).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42, 115-138.]
- 何琦瑜、賓靜蓀、張靜文(2012)。十二年國教新挑戰:搶救「無動力世代」。**親子天下**, 33, 134-143。
- [Ho, C. Y, Bin, J. S., & Chang, C. W. (2012). Rescue the generation without motivation--A new challenge to twelve-year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Parenting, Family Lifestyle*, 33, 134-143.]
- 吳明隆(2011)。**論文寫作與量化研究**。臺北市:五南。
- [Wu, M. L. (2011).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thesis writing*. Taipei, Taiwan: Wunan.]
- 吳清山(2013)。正向領導。**教育研究月刊**, 230, 136-137。
- [Wu, C. S. (2013). Positive leadership.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30, 136-137]
- 周淑華(2009)。**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正向管教與班級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
- [Chou, S. H. (2009). *The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 孟慧、梁巧飛、時艷陽(2010)。目標定向、自我效能感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心理科學**, 33 (1), 96-99。
- [Meng, H. Liang, Q. F., & Shi, Y. Y. (2010). The relationship of goal orientation and self-efficacy with subjective

-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33(1), 96-99.]
- 官柳延 (2014)。國民小學校長科技領導、教師教學創新與學生學術樂觀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 [Kuan, L. Y. (201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rincipal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er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student academic optimism in elementary schoo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nchu, Taiwan.]
- 林純燕、賴志峰 (2014)。國民小學新住民子女學校適應與幸福感相關之研究。《學校行政》，92，83-104。
- [Lin, C. Y., & Lai, C. F. (201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daptation and well-being of new immigrant children in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Administrators*, 92, 83-104.]
- 林淑惠、黃韞臻 (2008)。高中職學生學校生活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0 (2)，83-104。
- [Lin, S. H., & Huang, Y. C.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facto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0(2), 83-104.]
- 林新發 (2010)。正向領導的意涵與實施策略。《國民教育》，50 (3)，1-5。
- [Lin, H. F. (2010). The meaning and strategies of positive leadership. *Elementary Education*, 50(3), 1-5.]
- 林維芬 (2012)。「修訂 Enright 寬恕治療歷程模式」團體介入方案對國小兒童寬恕態度、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2 (4)，591-612。
- [Lin, W. F. (2012). The effects of revised Enright Process Model of Forgivenes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n forgiv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well-being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2(4), 591-612.]
- 林維芬、徐秋碧 (2009)。正向情緒輔導介入方案對國小學童情緒智力、生活適應與幸福感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131-178。
- [Lin, W. F., & Hsiu, C. B. (2009).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al intervention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life-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5, 131-178.]
- 張芳全、夏麗鳳 (2011)。新移民子女的人際關係與幸福感之研究。《彰化師大教育學報》，20，73-101。
- [Chang, F. C., & Hsia, L. F. (2011). A study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for immigrant children. *Journal of Education National*

-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0, 73-101.]
- 張奕華、許正妹、顏弘欽(2011)。分散式領導、教師學術樂觀與學生學習成就關係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NSC98-2410-H-004-011), 未出版。
- [Chang, I. H., Hsu, C. M., & Yen, H. C. (2011).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stributed leadership, teachers' academic optimism and students' achievemen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roject Reports (No. NSC98-2410-H-004-011), Unpublished.]
- 陳思縈(2011)。教孩子學會正向思考。臺灣教育, 670, 40-41。
- [Chen, S. Y. (2011). Teach children to learn positive thinking. *Taiwan Education Review*, 670, 40-41.]
- 陸洛(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8(1), 115-137。
- [Lu, L. (1998). The meaning, measure, 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8(1), 115-137.]
- 教育部(2014)。國民小學校別資料[原始數據]。未出版之統計數據。取自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5A930C32CC6C3818&sms=91B3AAE8C6388B96&s=D31E6CA27F2A50F1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Information on class at elementary schools* [Original data]. Unpublished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5A930C32CC6C3818&sms=91B3AAE8C6388B96&s=D31E6CA27F2A50F1]
- 曾文志(2007)。大學生對美好生活的常識概念與主觀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 38(4), 417-441。
- [Tseng, W. C. (2007). A study of folk concepts of the good lif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8(4), 417-441.]
- 黃曼琳(2010)。高雄地區國小教師正向管教與學生幸福感關係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縣。
- [Huang, M. L. (2010).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ositive discipline and students' well-being in kaohsiu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ingtung, Taiwan.]
- 黃德祥、邱紹一(2012)。教育幸福感的要素與發展。教育研究月刊, 220, 44-54。
- [Huang, D. H., & Chiu, S. I. (2012). The elements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well-being.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220, 44-54.]

- 黃韞臻、林淑惠 (2012)。父母婚姻關係、教養方式、個體休閒滿意度與大學生幸福感之相關探討 - 以臺中市六所大專院校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6 (1)，99-122。
- [Huang, Y. C., & Lin, S. H. (2012).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al marital relationship, parental rearing style, leisure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for college students-a case study of six colleges in Taichung. *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Arts*, 26(1), 99-122.]
- 鄧堅陽、程雯 (2009)。教師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及其增進策略。*教育科學研究*，4 (1)，70-72。
- [Deng, J. Y., & Cheng, W. (2009). Factors influencing teach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promoting strategy.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4(1), 70-72.]
- 謝傳崇 (2011a)。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教學影響之研究。*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101，59-82。
- [Hsieh, C. C. (2011a).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its impact on teacher's teach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Research*, 101, 59-82.]
- 謝傳崇 (2011b)。校長正向領導激發學校超越表現。*師友*，529，51-55。
- [Hsieh, C. C. (2011b). School outperformance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The Educator Monthly*, 529, 51-55.]
- 謝傳崇 (2012)。校長正向領導－理念、研究與實踐。臺北市：高等教育。
- [Hsieh, C. C. (2012). *Principal positive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Taipei, Taiwan: Hi-Edu.]
- 謝傳崇 (2013a)。卓越領導的核心信念：校長學術樂觀。*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 (5)，30-32。
- [Hsieh, C. C. (2013a). Core beliefs of excellent leadership: Principal's academic optimism.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2(5), 30-32.]
- 謝傳崇 (2013b)。十二年國教的挑戰：找回學術樂觀。*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30 (3)，25-34。
- [Hsieh, C. C. (2013b). A challenge to twelve-year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 regain academic optimism. *Educator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30(3), 25-34.]
- 謝傳崇 (2013c)。學生學術樂觀—正向力量讓他再站起來。*師友*，553，50-54。
- [Hsieh, C. C. (2013c). Student's academic optimism-Positive power to gather oneself again. *The Educator Monthly*, 553, 50-54.]
- 謝傳崇 (2014)。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對教師學術樂觀影響之研究—以學校創新文化為中介變項。*學校行政*，91，33-56。
- [Hsieh, C. C. (2014).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incipal positive

- leadership, school innovative culture and teacher academic optimism in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Administrators*, 91, 33-56.]
- 謝傳崇、許文薇 (2014)。國民小學校長正向領導、肯定式探詢策略與教師希望感關係之研究。*南大教育研究學報*, 48 (1), 67-86。
- [Hsieh, C. C., Hsu, W. W. (201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positive leadership, appreciative inquiry and teachers' hope in elementary schools. *Journal of Education Studies*, 48(1), 67-86.]
- 謝傳崇、蕭文智、王玉美 (2015)。國民小學教師正向領導與學生學習表現關係之研究。*學校行政*, 95, 81-101。
- [Hsieh, C. C., Hsiao, W. C. & Wang, Y. M. (2015).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Administrators*, 95, 81-101.]
- Andrews, F. M., & Withey, S. B. (1976).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New York, NY: Plenum.
- Argyle, M. (2013). *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Beard, K. S., Hoy, W. K., & Woolfolk Hoy, A. (2010). Academic optimism of individual teachers: Confirming a new construc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6(5), 1136-1144. doi:10.1016/j.tate.2010.02.003
- Carolyn, M., Youssef, M., & Luthans, F. (2013). Positive leadership: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across culture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42(3), 198-208. doi:10.1016/j.orgdyn.2013.06.005
- Cameron K. (2011)。正向領導 (謝傳崇譯)。臺北市: 巨流。(原著出版於 2008 年)
- [Cameron K. (2011). *Positive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C. C. Hsieh, Trans.). Taipei, Taiwan: Chuliu. (Original publication year: 2008)]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43. doi:10.1037//0003-066X.55.1.34
- Diener, E., & Chan, M. Y. (2011). Happy people live longer: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tributes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3(1), 1-43. doi:10.1111/j.1758-0854.2010.01045.x
- Hsieh, C. C., Yen, H. C. & Kuan, L. Y. (2014, December).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aching innovations, and students' academic optimism in elementary schools*.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 Sustainability, Technology & Education 2014, New Taipei, Taiwan.
- Hoy, W. K. (2012). School characteristic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ll students: A 40-year academic odyssey.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50(1), 76-97. doi:10.1108/09578231211196078
- Hoy, W. K., Tarter, C. J., & Woolfolk-Hoy, A. (2006). Academic optimism of school: A force for student achievement.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3(3), 425-446. doi:10.3102/00028312043003425
- Kelloway, E. K., Weigand, H., McKee, M. C., & Das, H. (2013). Posit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well-being.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 107-117. doi:10.1177/1548051812465892
- Mascall, B., Leithwood, K., Straus, T., & Sacks, R.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academic optimis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46(2), 214-228. doi:10.1108/09578230810863271
- McGuigan, L., & Hoy, W. K. (2006). Principal leadership: Creating a culture of academic optimism to improve achievement for all students. *Leadership and Policy in Schools*, 5(3), 203-229. doi:10.1080/15700760600805816
- Preacher, K. J., & Leonardelli, G. J. (2001). *Calculation for the Sobel test: An interactive calculation tool for mediation tests*. Retrieve from <http://quantpsy.org/sobel/sobel.htm>
- Seligman, M. E. P.,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2), 5-14. doi:10.1037//0003-066X.55.1.5
- Seligman, M. E., Ernst, R. M., Gillham, J., Reivich, K., & Linkins, M. (2009). Positive education: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classroom interventions.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5(3), 293-311. doi:10.1080/03054980902934563
- Woolfolk-Hoy, A., Hoy, W. K., & Kurz, N. W. (2008). Teacher's academic optimism: The development and test of a new construc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4, 821-835. doi:10.1016/j.tate.2007.08.004
- Wu, J. H. (2012).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academic optimism,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in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Ohio.
- Youssef, C. M., & Luthans, F. (2012). Positive glob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4), 539-547.
doi:10.1016/j.jwb.2012.01.007

Youssef-Morgan, C. M., & Luthans, F.
(2013). Positive leadership: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across culture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42(3), 198-
208.